

編者按

可以說，自80年代末以來世界進入了意識形態的解魅時代。這一潮流自然影響到90年代的學術研究方向。過去海峽兩岸的中國近現代史寫作，無不染上濃厚的黨派意識形態色彩。而本期「百年中國」三篇文章，都力圖凸現從前因意識形態解說而或被扭曲、或被忽略的歷史畫面。

孫隆基認為，由於20年代國共兩黨意識形態均「以俄為師」，因而造成人們對清末民初歷史的延續至今的某種誤解。作者引用大量歷史文獻證明：在許多活躍於清末民初政治和思想舞台的重要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李大釗、陳獨秀、魯迅，乃至蔣介石心目中，與中國現況相關的革命，往往不是俄國革命，而是法國大革命。「在20年代末以前，中國人運用社會心理學框框和法國大革命意象成語，其廣泛程度並不遜於後起的馬列主義階級分析和俄國革命掌故。」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忽略了學衡派。無獨有偶，本期孫尚揚、曠新年兩位年輕學者的文章都是重估學衡派。孫尚揚側重於論述西方新人文主義對傳統和現代的反省怎樣影響學衡派，使這一派知識分子在啟蒙與學術之間自覺地選定研究國學的學術立場；但在中國當時的形勢下，他們只能走向文化、學術的邊緣。曠新年則認為，出現於20年代初的學衡派，是對新文化運動主流的現代啟蒙主義和現代化運動的最早回應和批評。